



德才孰为先

康熙的用人观

□ 邓 涛

定。因此，康熙在提拔江苏巡抚宋荦时提到其“操守好、不生事”，即操守好的人管理地方不易新生矛盾。同时，康熙认为有才无德者“或自恃有才，辄专恣行事者，思之可畏”，有才无德之人，若不修德，之后终究会把才学用在邪道上。三是有助于革除积弊。康熙提拔直隶守道邵嗣尧为学政，尽管邵嗣尧“于倾剧之事未见其长”，即他并不善于处理具体事务，但依然提拔了他，原因便是他有操守，康熙认为他“必能秉公校士、革除积弊”，即有德的人更能秉持公正，真正革除弊端。

有德乏才 亦生弊端

康熙中前期，由于康熙践行以德为先的用人理念，达到了“广厉风节，群士慕效，吏治丕变”的效果，政风得到澄清，逐步实现了大治。但康熙过于强调德而忽视强调才，也带来了一些弊端。

一是有德乏才之人不能高效处理政务。康熙曾批评部分清官不能高效处理政务：“积年累月，概不完结，似此清官，亦何裨于国事乎？”康熙认为有德乏才之人造成政务积压，影响到施政效能。康熙曾批评操守较优的侍郎达哈：“近见尔衙门事务，弊端尚多，旗下人不无怨言。若但守己廉洁，而于凡事不能勉力肃清，究竟何益？”认为有德无才，于政务也是无益。

二是有德乏才之人不能维持地方稳定。康熙四十年，朝廷曾推荐道员施世纶担任湖南按察使，但康熙认为施世纶不适合负责监察工作，原因便是“其操守果廉，但遇事偏执，百姓与生员讼，彼必庇护百姓。生员与缙绅讼，彼必庇护生员。夫处事唯求得中，岂可偏私”。康熙认为施世纶虽然有德，但他有时认为自己是秉公办事，但实际上造成了新的不公，无助于地方稳定。此外，康熙曾批评某位巡抚不知处理关系：“今以己为清官，独市饼饵而食，兵丁赏赉不及，岂合于理？”认为他不谙人情，不知抚恤各方，也是无助于治理。康熙朝官员张伯行以清廉刚直闻名，康熙评价他“操守为天下第一”，但仅有德行是无法处理好政务的。张伯行初任巡抚之时，在移风易俗上确有成绩，但康熙五十四年康熙批评张伯行：“绌于才力，张弛失宜，反致新生事端，扰累民生，地方盈宁之状，迥不如前。”在康熙眼中，地方稳定无事是最重要的。

因此，康熙在康熙中后期开始强调官员的才干，注重德才兼备。但总体而言，康熙用人是以德为先；有才无德之人不用，如康熙朝吏部文选司郎中刘始恢有才但“声名颇劣，可令休致”；有德乏才之人酌情用之，如吏部文选司郎中宋文运“才虽平常，而操守声名甚好，朕不欲擢用升刑部侍郎”。



（上接1版）

什么是主义呢？“主义”就是核心的价值追求。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呢？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所倡导的、被共产党人所遵循的价值和灵魂，即造福人民和为绝大多数人谋福利，作为核心价值追求。如果为了这样的价值追求可以献出生命，那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样的信仰是科学的、理性的信仰，具有崇高的生命价值追求。

在实践中坚守共产党人的初心

我们往往会在不同的层次上使用

“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比如说，马克思主义分为三个组成部分，即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这里是指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再比如说，我们从事的事业是伟大的事业，因为这是造福人民的马克思主义事业，这里是指马克思主义的运动和实践。还比如说，我们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这里是指把这个主义当成信仰的人。

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实践运动，还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都贯穿着一个灵魂，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追求，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道”。古人云：“道不

良好的家风传承

欧阳修的父亲欧阳观，勤奋好学，50岁的时候考中进士，出任道州判官，其为人刚正不阿，为官清正廉洁、勤政为民、匡贫济困。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欧阳观去世后，其政绩仍为人所称道。

此时，年幼的欧阳修追随二叔欧阳晔，在欧阳晔身边深受其品质之风熏陶。欧阳晔在中了进士之后，担任地方官。欧阳晔为人处世的各种行为，深深影响了欧阳修。欧阳晔担任随州推官时，恰逢灾荒，大洪山奇峰寺上百个僧人却囤积大量粮食。京西路转运使怀疑这些僧人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命令欧阳晔前去查封僧人所囤积的粮食。这些僧人闻讯后，非常惊恐，给欧阳晔送来白银千两，请求其手下留情。欧阳晔拒收贿赂，难能可贵的是他还能为僧人着想，告诫僧人只要把囤聚的粮食卖给官府用来赈济灾民，就会没有灾祸。这些僧人高兴地答应了。欧阳晔的决策，既免了僧人之灾，又让官府收购僧人囤聚之粮，让饥民免于饿死。

欧阳晔廉洁求实的作风给欧阳修深刻的影响。欧阳修之母在欧阳修长大之后对他说：“你想知道你父亲吗？看看你二叔就可以了。他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很像你父亲。”

欧阳修的母亲郑氏对欧阳修要求非常严格，不仅教儿子读书学习，而且还把欧阳观生前为官的“廉”、奉亲的“孝”、从政的“仁”，传授于欧阳修。当时家庭贫困，为了鼓励欧阳

作为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是人类社会活动的记录以及对这些记录所作的梳理和研究。由于历史记录是前人见闻的主观描述，不像自然科学那样凭借实验数据说话，即便秉持客观公正的纪实原则，在还原真相的过程中，难免带有一定的情绪化倾向，不同版本的史书，对同一事件、同一人物的描述不尽相同，这就为后人读史带来了诸多困惑。但从很长一个时期看，人类社会活动留下的轨迹，在大的方向和趋势上，脉络是清晰的，这就为我们科学地认识人类社会发

展史提供了依据。也就是说，影响历史进程的因素是客观的，是有规律可循的，就拿古代战争来说，其基本逻辑也是可以认知的。

爱好和平，反对战争，是全人类的共同心声，但打仗的事却是经常发生的，歌舞升平的年代与战火纷飞的岁月相比非常短暂，弥足珍贵。可以说，人类是伴随着战争成长起来的，从原始社会人类为争夺猎物引发的部落火拼，到现代社会为争夺利益发生的局部冲突，战争从未止息过。在有文字记载的5000多年人类史上，大大小小的战争不下万次。氏族部落也好，国家城邦也好，其所以能生存，离不开人口、地盘和资源，其所以能壮大，则须占有更大的地盘、更多的人口、更充沛的资源。占有的手段无非是侵占与兼并，侵占与兼并的冲突加剧，战争则不可避免。“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不论西方文明史还是东方文明史，都是血与火书写的，都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历史。不论你对战争持何种态度，都不得不承认，在大部分时间里历史的车轮是被战争驱动的。

回看华夏文明的历史进程，自从

修养成爱学的习惯，郑氏虽然没钱购买笔墨纸砚，但是，想方设法地创造条件让欧阳修学习。郑氏拿家乡的荻草为材料制成笔，以沙盘为纸，让儿子欧阳修认字写字，这就是流传至今的“欧母画荻”的故事。郑氏让儿子欧阳修诵读《毛诗》《春秋左氏传》等经典书籍，培养孩子清朴思想。史书记载了欧阳修之母郑氏教育其子的情形：“母郑，守节自誓，亲海之学。”欧阳修在母亲影响下，主动积极地去读书，经常跟邻居借阅书籍，终为其后来成为大文豪奠定基础。“吾家又贫，无藏书”的欧阳修看到邻居“有弊筐贮书在壁间，发而视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借阅后，回家潜心研读，终有所获。

识见高对策实

1044年4月，宋仁宗委派欧阳修赴河东路巡视考察民情。临行前，欧阳修上书宋仁宗，请求皇帝向河东路颁发诏令，此次巡视，沿途官员不准出城迎送，不准奢华接待，一切宜简，不能给基层加重负担。在巡视河东路及周围地区过程中，欧阳修能够在掌握真实民情民意基础上，通过给皇帝上折子，提出科学的解决对策，进而为化解民忧奠定基础。欧阳修来到绛州等地的时候，老百姓前来倾诉，过去从近处解池领取蚕盐，后来官府下令，让百姓去远处三门这个地方领取蚕盐，由于路程较远，又是农忙季节，有的百姓交纳盐钱、放弃领

盐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上下5000年的历史延续，哪一次部落火拼、哪一次改朝换代不是通过战争实现的？即便王位继承也不全然是和平交接，大内喋血的事时有发生。最典型的战争画卷当属春秋战国，五霸七雄的那些事儿说来话长，孟子用一句话就概括了：“春秋无义战。”由此引出了战争的性质问题：义与非义。儒家认为，“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才是合乎义的，而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没有合乎义的战争。可古代战争的历史告诉我们，交战双方并非都是以义与非义影响历史进程的，义与非义推定的是战争动因和过程的性质，很难臧否战争结局的性质。事实是，一上来，野蛮摧毁了文明；返回头，文明又同化了野蛮。

春秋战国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朝代，而是东周各诸侯之间争斗不已的内战时期。只有当秦国吞并了其余六国，废除了以分封为主体的王室世袭制，开始了以郡县为主体的中央集权制，才建立起一个新的王朝。战国七雄中，秦国地处边陲，开化较晚，直到公元前770年周室东迁时，秦襄公派兵护送有功，才被周平王封为诸侯。“孔子西行不到秦”的说法很多，或者说孔子不愿去，或者说秦国不让去，但有一点不容置疑：那些以仁治国、以德治民的诸侯一个个都灭亡了，唯独拥有“虎狼之师”的秦国，不喜“王道”，热衷“霸道”，奖励军功，变法图强，最终一统天下。秦王扫六合之举，又如何界定义与非义？

春秋时期的鲁国，是周公之后姬姓的“宗邦”，一些只有周天子才能享受的礼乐，在鲁国可以得到特许。当周室衰微、被迫东迁之后，鲁国成

价值作为核心价值追求。如果制度理念、制度安排和制度设计是围绕让社会整体利益得到有效满足而提供充分的制度保障，这样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这样的社会就是社会主义社会，这样的文化就是社会主义文化。

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就是“道器不离”：马克思主义是灵魂，社会主义是载体；马克思主义是价值追求，社会主义是价值实现方式；马克思主义是“道”，社会主义是“器”。如果马克思主义离开了社会主义，它只能成为空想，只能成为空中楼阁；如果社会主义没有了马克思主义，就会丢魂，就

盐，结果官府竟然不答应，强迫百姓前往三门领取蚕盐。欧阳修了解这个情况后，给宋仁宗写了一个折子《免绛等州人户远请蚕盐牒》，不仅反映了百姓的苦楚，而且请求朝廷允许百姓交纳盐款后放弃远程领取蚕盐的任务。

欧阳修来到芦洲的时候，发现有一些县人丁稀少、土地荒凉、诉讼很少，不值得配有县名，浪费了执政资源。欧阳修据此上奏朝廷，建议朝廷能根据实际情况，撤销这些县的建制，裁减官员，减百姓负担。这些识见高对策实的意思，虽然当时朝廷没有采纳，但是得到后来统治者的采纳，并取得了良好效果。随后，欧阳修来到麟州，亲临黄河之边，通过询问戍卒、考察地形，经过权衡和思考，给朝廷上书，认为麟州“城壁坚完，地形高峻，乃是天设之险，可守而不可攻”，不赞成迁废麟州之举，而应该保留麟州建制，减少常驻士兵，提升士兵质量和战斗力。朝廷采纳了欧阳修这一建议，麟州得以保全，宋朝西部边防有了一道坚实的屏障。

宽简待人 不图虚名

1048年，欧阳修在扬州为官的时候，刚上任，就给前任扬州行政长官韩琦写信：“遵范遗政，谨守而已。”他在扬州的施政方向是继承韩琦的施政风格，宽简待人，不图虚名，遵循规律，讲求实效。这种继承前任施政风格，坚持功成不必在我原则，与欧

周礼的典藏者和实施者，是周朝文献典章最完备的诸侯国，时人称“周礼尽在鲁矣”。鲁国尽管是个出了名的文明礼仪之邦，但却经常遭受欺侮。不仅左右邻舍侵扰它，就是远在“荆蛮之地”的楚国，也不把它放在眼里。楚王召集附属于楚国的诸侯会盟，并指定鲁君为他驾车。鲁君同臣子们商量，鲁虽小国，但也是当年周天子封的，现在楚王居然要我为他驾车，这能答应吗？臣子们都说不可。只有公仪休说，不可不听楚王的话，否则将有亡国之虞；保护鲁国及其百姓的生存，是您义不容辞的天职啊！没办法，鲁君只好给楚王当车夫。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秀才遇到兵”的典型案列。看完《说苑》中的这段故事，后人除了感受到楚王的傲慢与霸道外，也不能不为鲁国的处境和命运而担忧。可担忧又有什么用，该发生的事终究要发生。到了公元前249年，先后传二十五世三十四君的文明礼仪之邦鲁国，还是被“蛮夷之地”的楚国给灭了。

值得注意的是，野蛮部落灭掉了文明族群，虎狼之国吞并了礼仪之邦，在人类社会发展并非个案。这类“秀才遇到兵”的历史现象，在整个世界史上都曾发生过。强盛的罗马帝国并不是被比它更先进的文明种群所征服，而恰恰是灭亡于野蛮的汪达尔人入侵；城市文明发达的达罗毗荼人亡于雅利安人；壮丽的埃及王朝亡于西克索人；光芒四射的希腊诸城邦亡于马其顿人等等，均属游牧、半游牧文明战胜农耕文明的典型例证。在中国，宋、明两个王朝也都是被北方经济文化落后的少数民族灭亡的。偏安王朝因没落而退出历史舞台，化外族群因雄起而登上历史舞台，继而改变正统走向的情形发生后，尽管受到

会走邪路。

由此可以看出一个清晰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无论有多少个理论形态，它的“道”只有一个，而实现马克思主义价值追求，即“行道”的方式可以有很多，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具体模式可以有多个。苏联解体 and 东欧剧变并不能说明社会主义的失败，更不能说明马克思主义的失败，只能说明苏联模式具体路径的失败。同样的道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说明每个国家、每个民族可以而且必须根据自己的文化传统、历史条件、面对的课题和任务、人民的需要和要求，选择适合自己的造福人民的具体道

阳修一贯提倡的理政政务简思想是相吻合的：“夫理繁而得其要则简，简则易行而不违。”欧阳修的理政政务简思想不是消极不为的，而是积极进取的，是力求高效的。他在扬州为政，吏治井然有序，百姓安居乐业，扬州人在他离开之后为他建造生祠。

1058年6月，欧阳修权知开封府。欧阳修的前任是有名的包拯，以威严刚毅著称于世。欧阳修的施政风格却是宽简，当时被人诟病，指称他不能够与包拯相提并论。然而，宽简不是不作为、乱作为，而是按照规律和法则办事。包拯的威严是对非法官员，然其亦有宽舒一面，是对百姓而言；欧阳修的宽舒是对百姓而言，然其亦有威严一面，亦是对非法官员而言。从这一点上看，欧阳修继承了包拯施政的某些风格。欧阳修上任后，面对京师权贵有恃无恐的违法现象，非常痛恨，并决定予以严加惩罚。当时有个宦官叫梁举直，私自动用官兵，触犯法律，被交付开封府处置。当时，官中传出口令，希望欧阳修能够对梁举直法外开恩，宽舒其罪。欧阳修顶住压力，最终将梁举直绳之以法。欧阳修在《论梁举直事封回内降札子》中对“曲庇小臣，抗屈国法”的行为进行痛斥，入情入理地批判宽舒罪过是不值得提倡的，也是不允许的事情。从中可见欧阳修“威严”的一面。



文明与野蛮的较量

古代战争的基本逻辑（二）

□ 王兆贵

前朝志士顽强的抵制和反抗，但当尘埃落定，河山重整，世人别无选择，只能像牧牧慨叹的那样“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了。



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本身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转换而不断完善和发展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实现造福人民的马克思主义价值追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实现形态，就是造福人民的具体实践和现实运动。正是基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和价值认同，我们把全国十几亿人的力量凝聚起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共同奋斗，带领人民不断创造“中国奇迹”，不断创造美好生活。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副主任、教授】